

019353

南乐县教育志

南乐县教育局委员会编

黄山书社

南乐县教育志

南乐县教育局编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王筱燕

封面设计：魏章仲

南乐县教育志

南乐县教育局编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河南省信息开发应用所制版

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插页：8 字数：297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80630—284—0/K·124

定价：39.50 元

南乐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 黄相军
副主任 郭周联 袁进卿 张 洪 仇建钢
委员 王合方 刘民泽 赖章普 宋超英 唐正道 杨合宪
王怀松
顾问 薛荣秀 孙守正
主编 路秉灿
副主编 王怀松
采集 海廷柱 屈永信 李永长 王庆府 刘现省 仝超群
杨庆丰 端木景堂

序（一）

南乐乃仓颉故里，人文历史悠久，教育渊远流长。只是鸦片战争之后，官府腐败，外敌入侵，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教育日趋落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危亡中的中华民族带来希望，南乐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与日寇及封建反动势力浴血奋战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南乐教育再逢生机。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南乐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十年“文化大革命”，教育遭受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近几年来，县委、县政府确立了“科教兴县”的战略指导思想，逐年增加教育投入，使南乐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编史修志，旨在“存史、资治、教化”。“南乐县教育志”是第一部反映南乐教育发展全貌的专业志书，它以翔实的资料、完备的体例、如实而全面地记述了南乐教育发展的曲折历程，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南乐教育的整体改革与振兴提供了历史借鉴。

该志书，还为在发展南乐教育中贡献卓越的模范人物立传题名，他们将英名留千古，业绩垂后人，激励全县教育工作者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献身培养革命后代，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出更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南乐县人民政府县长 郑大文

一九九七年五月五日

序 (二)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之优秀文化传统。南乐教育志工作始于教育勃兴的1983年。教育志办公室人员几经寒暑，历尽奔波，四处调查访问，翻阅档案古籍，征得相当珍贵的南乐教育历史资料。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志未成而该工作一度中断数年。

1996年，南乐教育生机蓬勃，尊师重教蔚然成风。为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于教育改革、创新和振兴，县委以前段教育志工作为基础，再度组织力量编修《南乐县教育志》。编者精思辑著，艰辛笔耕，历经半载，终使志稿告竣。

《南乐县教育志》之问世，必将对发展南乐教育、振兴南乐经济有着重要的资治作用。我衷心祝愿它能启迪今人、垂示后代，成为推动南乐教育前进的资治之书而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南乐县教育志》为南乐教育首创之志，乃南乐教育之百科全书。因时间紧迫，受修志人员知识所限，故缺憾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南乐县教育局委员会主任 黄相军

一九九七年五月八日



凡 例

一、本志书上限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下限断至1996年，个别地方上伸或下延。

二、本志书记述的区域以现辖12个乡镇为准。涉及历史，则以当时区划为准。

三、本志书以类分章，章下设节、设目，横排竖写，纵合结合。

四、本志书大事记以时系事，纵贯古今，以编年体为主，兼取记事本末体。

五、本志书遵循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原则，内容详今略古，尤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南乐教育，力求反映其各个时期的全貌及其经验教训。

六、本志书人物章所记人物为对本县教育有突出贡献者、或南乐籍之教育界名人；设传记、简介、名表、名录等节，循史家通例，生不立传。县教育行政部门历届主要负责人及现任正副职负责人列简介。

目 录

概述	1
大事记	10
第一章 官学 私学 书院	28
第一节 官学	28
第二节 私学	31
第三节 书院	32
第二章 幼儿教育	36
第一节 幼儿教育发展概况	36
第二节 管理与经费	37
第三节 教师与教学	38
第四节 幼儿园选介	38
第三章 小学教育	40
第一节 小学教育发展概况	40
第二节 学校设置	42
第三节 学制与课程	50
第四节 教学与教研	53
第五节 义务教育	57
第六节 管理与经费	58
第七节 小学选介	61
第四章 普通中学教育	88
第一节 普通中学设置	88

南乐县教育志

第二节	学制与课程	89
第三节	教学与教研	91
第四节	体育与卫生保健	94
第五节	招生与学籍管理	97
第六节	中学选介	99
第五章	中等职业教育	120
第一节	师范教育	120
第二节	农(职)业学校	122
第三节	其他职业学校	126
第四节	农(职)业学校选介	127
第六章	成人教育	130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民众教育	130
第二节	“两战”时期的冬学运动	137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成人教育	138
第七章	德育	147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德育	147
第二节	“两战”时期的德育	148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德育	149
第四节	德育途径	152
第八章	教师	157
第一节	发展概况	157
第二节	教师管理	158
第三节	教师培训	160
第四节	教师的社会地位	162
第五节	教师的生活待遇	166
第九章	教育行政	170

目 录

第一节	机构沿革	170
第二节	管理体制	183
第三节	教育系统的共产党组织	184
第四节	群团组织	185
第五节	教育经费	189
第十章	师生爱国运动	193
第一节	简师“读书会”	193
第二节	“十人团”与“乡教团”	195
第三节	支前参战	196
第十一章	人物	198
第一节	传记	198
第二节	简介	207
第十二章	附录	326
	南乐县政府及县教委部分文件	326
后记	408

概 述

南乐乃仓颉故里，文化教育源远流长。汉置乐昌县（今南乐县），历经沧桑，文化教育长盛不衰，曾培育出颇负文才武略的栋梁之材。唐代名将张公瑾、杰出的天文学家张遂（张一行），均为名彪史册的一代英杰。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发展到鼎盛时期，为之服务的教育，也得以较大的发展。始于五代的书院，兴于元朝的社学，及历史悠久的私塾、义塾等都有所增加。史籍记载，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南乐有社学二十六处，儒学一处，义塾二处，私塾之多难以统计。发达的教育，使南乐被誉为“人文荟萃之域”，仅万历年间，南乐就考中八名进士。一代贤臣魏允贞、李从心、梁天奇等皆为朝廷命官。至清代乾隆及同治间，分别创建繁阳、乐昌两处书院。这期间，民间私塾也有发展，最有成就者，应属县北官庄任氏私塾。光绪末，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南乐在冀南率先改繁阳书院为蒙养学堂，开官办小学教育之先声。光绪三十年（1904），改乐昌书院为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县儒学开办师范传习所，此为南乐师范教育之始。光绪三十二年（1906），始设管理教育的专门机构——劝学所。时任知县施有方亲任全县学堂监督，积极筹措款项，在民间捐资兴学，官办教育逐渐兴起。据光绪二十九年

(1903) 统计, 时有模范小学堂 15 处, 蒙养学堂 94 处。

宣统元年 (1909), 县人贾伯岩、武经筵被派赴日本留学并考察学务, 回国后, 在全县创办高等小学堂 11 处, 并大力倡导女子教育和职业教育, 创办女子小学堂 2 处, 林业学堂一处。《南乐乡土志》(成书于清末) 载, 清代末期南乐全县有 30355 旗户, 男 89524 人, 女 89612 人, 入学官就读者 400 余人, 入高等小学堂就读者 134 人, 入两等小学堂就读者 300 余人, 入蒙养学堂就读者 400 余人。全县共有学生 1200 余人, 占全县总人口的 1.5%。

民国改元, 改学堂为学校。原劝学所并入县署改设劝学科。民国二年 (1913), 增设学务委员, 以筹集资材, 兴建学校为职责; 民国三年 (1914), 劝学科再改设教育局。是年, 县属各区均设学校, 不再依附官办, 这对于教育之普及有着积极作用。据统计, 民国十九年 (1930), 全县有公立男校 265 处, 学生 7838 人; 公立女校 7 处, 学生 214 人; 私立男校 1 处, 学生 42 人。全县学龄儿童 52908 人, 入学儿童 8094 人, 在校学生仅占全县学龄儿童的 15.2%。是年改师范传习所为“乡村师范”, 次年又改为“简易师范”, 并招收女子师范一个班, 学生 33 人。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 全县有公办高级小学 5 处, 另有女子高小 1 处, 私立高小 1 处, 以上学校共有学生 396 人; 公立初级小学男校 293 处, 学生 12723 人; 初级女校 11 处, 学生 396 人; 民众学校 156 处, 在校学员 800 余人, 全县教师共计 303 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 学校教育全部停办。1938 年, 共产党人深入城乡, 发动群众, 组织抗日救亡运动, 在日伪势力薄弱的地方开展抗日教育, 并在教育界组织起乡村教育工作团、抗日救国十人团和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等进步团体。一批知识分子经过培

概 述

训后分散至各村，开办抗日小学。1940年，县抗日民主政府设立文教科，专职负责抗日救国的学校教育。只是因处于战争环境，学校多处于游击状态，时聚时散，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

到1944年，抗日武装已日益壮大，日伪势力大势已去，县东4个行政区的抗日小学先后恢复。当时的学校教育以服从抗日战争为宗旨，学生均为儿童团员，站岗放哨，深入群众作抗日宣传。这一时期的学校，没有统一的学制规定，无课本，多靠教师自编教材，对学生进行识字和抗日爱国教育。

抗日战争期间县西的五、六区（今近德固、元村、寺庄、梁村等乡镇）划归卫河县（抗日时期新划县），属日伪势力盘踞。汉奸杨法贤在千佛村设立南（乐）大（名）联立高小和四俭中学，对学生进行反共亲日的奴化教育。在民间，没有官办学校，多设私塾。

抗日战争胜利后，教育一度迅速发展。革命政府吸收大批知识青年及旧知识分子，经培训后到各村创办小学。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祖辈遭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政治翻身和文化翻身，积极送子女进学校，使村村学校爆满。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遵循为战争服务、为生产服务的办学宗旨，校校成立儿童团、姐妹团，参加大生产运动和斗争恶霸地主的土改运动。尤其在支前、参战活动中，学校师生不仅深入群众进行政治宣传和发动，且有大批师生投笔从戎，踊跃走上解放战争的前线。

在发展学校教育的同时社会成人教育也有极大发展，村村办起冬学、夜校，广大农民争先恐后参加学习，白天搞生产，夜晚学文化，更使农村气象为之一新。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全县共有小学236处，在校学生11372人，教职员248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冬学、夜校学员有7200余人。

二

新中国建立初期，贯彻政府“整顿、改造”的教育工作方针，加强教师思想改造，整顿了教师队伍，调整了高级小学和完小的布局，全县六个行政区分别设立9处完小；各村小学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对教师分批分期进行政治和业务培训，努力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思想和业务素质。县设文教科，区设文教助理员，村设文教员，分别负责各级文教工作。完小、各中心校均明确有校长，确立了领导体制，使用统编教材，建立了教研制度，并学习苏联的教育、教学经验，加强了教学工作的领导与管理。在小学教育稳定发展的同时，于1951年创建了县立初级中学，并为了尽快培养师资以适应初级教育发展的需要，在中学附设了师资短训班。

1953年12月，国家政务院发出《关于整顿和改造小学教育的指示》，根据指示精神，确定城高、东街中心校、元村中心校、韩张中心校为县重点学校，由县文教局和教育工会直接领导，经常总结这些学校管理、教学等各方面的经验加以推广，从而大面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1956年，县境大部分地方遭受洪水灾害，受害学校达134所之多。由于政府重视，采取多方面救灾措施，秋后中小学均如期开学，并新发展民办小学72个教学班，县立中学新招收2个高中班，发展为拥有18个教学班的完全中学；元村、韩张、福

概 述

堪、西邵、张浮丘五处完小均招收 2 个初中班，发展为“戴帽中学”，受灾之年成为教育发展年。

这一时期仍延续“两战”时期的优良传统，学校教育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生产。在“三反五反”、“肃反”、“抗美援朝”、“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运动中，中小学师生都充当政治宣传队伍的主力军。

建国初期的成人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全县开办 38 个干部职工文化补习班，其中扫盲班 15 个，高小班 4 个、初中班 19 个。共有学员 1210 余人。农村的冬学和夜校，转为比较正规的民校，广大农民学文化，学农业科学技术。在建国初期干部职工队伍文化水平偏低的情况下，成人教育不仅使之整体文化素质得到提高，并且有不少青年农民通过民校学得文化科学知识，走向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补充了干部职工队伍的不足。

从新中国建立至 1956 年，南乐教育事业在巩固中稳步发展，教育、教学质量是建国后的最佳时期之一。

1957 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使大批中小学教师受到政治伤害，全县有 147 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27 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分子、17 名教师打成坏分子。其中大部分被解除公职。这一运动为广大教师形成了严重的精神压力，使之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谨言慎行，主动性、创造性受到极大束缚。

1958 年进行反右补课，又有部分教职员受到错误处理。是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带来教育的盲目发展，全县中学（含民办）发展到 17 所，当年招收初中新生 2412 人，高中新生 140 人，在校中学生达 4395 人。并创办了中师和幼师。中等教育脱离实际的发展，使中学、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均受到严重影响。师生参加大办钢铁和深翻土地劳动及其他各种政治活动，小

学还实行“四集体”（集体学习、集体劳动、集体住宿、集体食堂），不仅使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严重影响。

1961年以后，贯彻中央“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执行中央制定的《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精减中学，对各类学校进行整顿，在教学工作中，严格规定教学工作量，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提倡少而精的教学方法，重视教研工作，使正常的教学秩序逐渐恢复，教育、教学质量迅速回升。至1966年，中学巩固到6处，在校生2100余人；小学发展到401处，在校生39293人；中小学教职工计1627人。另有民办农中点（班）26处，在校生1141人，教师45人。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县教育事业经受一场空前的大劫难。教育行政机关长期瘫痪，学校领导干部及广大教师成为革命的对象，学生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大批“智育第一”、“师道尊严”，众多的热爱教育事业，有才有识的中小学教师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被罗织种种罪名挨批挨斗。有些中小学（如一中），长期停办，校舍权作他用。教育系统一片混乱。

196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省两名教师的一封信，主张把中小学公立教师下放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使南乐大批中小学教师外流。

1969年，在“上初中不出队，上高中不出公社”的口号影响下，队队小学都附设有初中班，12个公社都办起了高中。是年高中发展到13处，初中发展到107处，在校中学生7300余人。

1972年开展的批判“智育回潮”，1973年的“批林批孔”运

概 述

动，1974年的“马振扶中学事件”，连续冲击着逐渐恢复的教学秩序，搞得学校领导干部及广大教师无所适从。这一时期，旧的教材遭受批判，新教材只注重其所谓政治性，而知识性、系统性全被打乱。中学教育的膨胀，使大量小学教师到中学任教，不得不吸收大批民办教师充实到教师队伍。十年浩劫，已使教育事业濒临到解体的边沿。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带来了教育事业的春天。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在总结“文革”期间经验教训的同时，全县教育系统拨乱反正，平反了1957年“反右”运动及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迅速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广大教师解除了长期肩负的精神枷锁，扬眉吐气地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1977年全国高考制度的恢复，极大地鼓舞了教师教书育人和学生立志成才的积极性，进一步促使各级各类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迅速形成。为给“文革”中的高中学生以重新争取到深造成才的机会，1978年开始，县文教局在谷金楼崔方连续二年举办复习班，该复习班为大专院校输送了大批合格新生。

1980年，加强各级学校领导班子建设，不断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加强了中小学教师培训、进修工作的领导，并注重教研工作，组织观摩教学活动，推动教法改革，采取多方面措施，有效地提高了中小学教学质量。

1981年，贯彻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精神，各行各业尊师重教蔚然成风。1982年开始着手压缩高中，调整初中，巩固提高